

生命政治反抗资本统治的三重原则

——从奈格里的激进政治解读出发

李胤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 奈格里认为, 当代左翼思想家往往把生命政治解读为掌控生命的权力, 却相对忽视了其中蕴含的主体性政治力量。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反抗与资本统治相对立, 这种反抗主要体现在资本统治的三个原则之上: 价值标准、权力形式、私有财产制度。在价值层面, 生命政治生产创造了特殊的使用价值, 无法进行量化计算, 不能直接作为交换价值出现在资本市场中; 在权力层面, 生命政治活动展现了主体性的自由, 在逻辑上它的存在先于权力统治, 其反抗也超越了权力所设定的范围; 在私有财产层面, 生命政治劳动具有自主性, 可以全面占有自身的劳动成果。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反抗构成了当代社会运动的理论表征, 寻求当下改变世界的道路首先要揭示这种反抗的内在本质。

关键词: 生命政治; 价值; 权力; 私有财产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6-0041-06

在当代左翼的政治哲学中, 生命政治构成了一个核心话题。学术界往往侧重于从权力统治的视角出发来解读生命政治。在这一视角下, 生命政治被视作一种掌控生命的权力, 也正是这样一种控制生命的外在力量, 构成了当代左翼批判的绝佳样本。然而, 这里同时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困境, 那就是基于这一视角的思想仅仅只能停留在批判的认识论层面, 它无法继续为批判之后的变革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与同时代的左翼理论家不同的是, 奈格里还将生命政治解读为“生命本身的力量, 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1](36)}。奈格里的这一解读内含一个重大的突破, 即他从权力统治的视角转向了被统治者的主体性视角, 进而阐发了一种新的理解生命政治的思想路径。在新的视角下, 生命政治作为一种主体性的“政治”力量, 体现在与统治结构的对立关系当中, 它能够反抗统治提供内在动力, 为社会关系的变革提供可能性, 而同时代的思想家则普遍忽视了这种被统治视角下的反抗形式。因此, 要理解奈格里对生命政治解读的独特之处, 首先要理解这个重大突破的内涵与意义, 这就需要我们探寻新视角下主体性反抗的可能性问题。

在当代资本统治的语境中, 资本不满足于仅仅在

物质生产领域吸收和规训劳动, 它把自己的统治原则运用到了社会生活领域, 意图达到全面地控制和占有社会生命的目的。资本统治的这种越界行为直接构成了资本与社会生命之间的对立, 为生命政治的反抗创造了前提条件。而资本在其统治的过程中实行着三重原则: 第一, 资本把价值规律作为统治的标准; 第二, 资本把权力形式作为统治的保障; 第三, 资本把私有财产制度作为统治的前提。这三重原则一同构成了资本统治的体系结构。在这一背景下, 想要深刻地洞察生命政治反抗的原因, 进而弄清楚它如何能够成为一种主体性的政治力量, 就要深入到它与当下资本统治原则的对立关系之中, 揭示其内在本质。

一、生命政治生产对资本价值规律的逾越

在物质生产领域当中, 通过“价值的增值”来实现资本的积累是资本逻辑的主要目的。这种“价值的增值”不是指价值变得更有效用或者更有意义, 准确地说, 它是指价值在量上的增加, 因而这种价值是可以计算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价值量的来源及其与劳动的关系, “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

收稿日期: 2018-03-20; 修回日期: 2018-05-17

作者简介: 李胤(1988—), 男, 黑龙江佳木斯人,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 联系邮箱: liyin_rain@163.com

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52)}。可见,在价值与劳动的关系中,劳动被劳动力所替代和规定,这种劳动力是无差别的、同一的简单劳动,正是这种劳动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量结果决定了蕴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价值量。也就是说,价值量化的内在本质是对劳动的抽象,它抽掉了具体劳动的“质”的层面,留下了抽象劳动的“量”的层面,它把熟练和复杂的劳动变成了简单的劳动,把劳动变成了劳动力。这就使劳动失去了它的本质——那种创造性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2](54)}。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这一可计量的价值规律蕴含在商品这种物质形态之内,价值的增值就表现为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然而,当下资本统治已经渗透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当中,“在社会资本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工人整日都处在普遍性的生产之中”^{[3](11)}。因此,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只局限于物质产品的生产,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在资本积累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产生了新的价值。奈格里对这一现象做了一个直观的表述:“今天,一个公司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非物质财富,如‘商誉’(good-will)和其他不可见要素。”^{[1](220)}这说明资本已经把自己的统治原则运用到了非物质产品的价值积累之上,意图达到对全部社会生产的控制和占有。

可见,针对非物质生产劳动所产生的价值,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有效的价值规律已经很难具有完全的解释作用。在资本积累的內部,虽然非物质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成果往往被资本置于其物质产品之上,构成了物质产品价值量的一部分,好像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价值与物质生产劳动的价值具有同质性,都可以用量的方式来衡量。但这只是资本统治所造成的表象,这种统治的目的,是把所有社会生产的价值——无论是可计算的物质劳动生产的价值还是不可计算的非物质劳动生产的价值——都纳入资本自身的价值规律中,统一按照资本的价值增值的逻辑来进行处理。但事实上,仅对非物质生产劳动本身而言,它独立产生的价值无法像物质劳动产生的价值那样通过精确的计

算来衡量。因为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产品并不以物的形态存在,它没有作为商品的实体属性,因此,它就无法化约为简单劳动的集合,更不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它实现的是一种“奇异性”的创造,这种价值内涵变更了物质产品的价值“量化”的本质。奈格里对资本统治企图占有并同化非物质生产价值的行为作了高度的概括,“为了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必须异化生产性的奇异性,对生产性协作进行控制,并驯化价值的非物质和逾越性的特征”^{[1](194)}。根据奈格里的观点,非物质性劳动产生的价值本身具有逾越性,只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中被资本强行占有了。

资本这种施加在全部社会生产之上的统治必然会引起社会生活领域中生命政治的普遍反抗,而且这种反抗与物质生产领域中雇佣劳动者的反抗是不同的。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命的反抗原本一直存在,因为“资本家的侵占具有绝对的对抗特性。这一对抗起源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被切断的关系”^{[3](99)}。而且,资本通过雇佣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并无偿占有它,这时劳动者的反抗主要是集中在他们的劳动能换回多少生活资料的层次上,也就是劳动者在物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能够换回多少交换价值的阶段上。因此,这种反抗的前提是承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规律。

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生命政治生产只是主体为自身生产使用价值,与其他任何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价值形式相对立,因而生命政治生产直接构成了对资本统治的价值规律的反抗。具体来说,生命政治生产是一种非物质生产活动,其成果没有实体属性,无法成为具有物质性的商品,因而它无法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在市场中进行量性的交易。更重要的是,这种生命政治的生产成果只能作为对生命本身有效用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存在。使用价值来源于主体自身的创造,无论在物质生产领域还是在以非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生命政治领域中都是如此。但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这种创造性的使用价值的地位是有区别的。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商品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表明了这两种不同价值形式之间的矛盾对立。这一矛盾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愈演愈烈,因为资本注重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作为劳动主体的创造对资本的价值增值目的并无效用。因此,这样的使用价值只能作为商品这个矛盾统一体的一极存在,并且无法在矛盾中消灭作为交换价值的另一极。但是,在生命政治领域中,劳动产品只具有对主体的使用价值,而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它不存在像商品内

部那样的矛盾二重性。确切地说，这种使用价值作为生命政治产品的总体而存在，它摒弃一切的交换价值。因此，当资本统治试图将它的价值规律运用到生命政治领域，进而将整个社会生活囊括到自身的逻辑规范之内时，必然会引起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反抗。

因此，在生命政治语境下，以生命政治劳动形式存在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所具有的逾越性已经表现出来。“生命政治劳动过程的自主性以及价值的不可计量的逾越性都是当下资本主义统治中矛盾的核心要素。”^{[1](194)}这种对抗在当前的社会生产之中已经形成，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奈格里指出：“现在，在后工业时期，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性价值已经通过包纳（而非排斥）生产的所有其他要素而成为霸权性价值。很明显，因为这种演化，现在已不可能将（经典形式的）价值规律视为计量全球经济体系的法则，或者均衡的准则。”^{[1](222)}可见，无论是生命政治生产的价值的理论分析，还是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现实，都表明了通过生命政治活动产生的价值的逾越性，这种逾越性突出了生命政治的主体性维度，突破了资本的控制，由此构成了对资本统治价值规律的反抗。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逾越的过程“溢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传统所构建的控制劳动力和价值生产的藩篱”^{[1](223)}。

二、生命政治生产对资本权力形式的挑战

资本的价值规律受资本逻辑的控制，这种控制在政治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形式。当今权力以一种稳定的结构化形式存在，它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奈格里认为，今天真正支配我们的主导权力不是中世纪以来的暴力和神学的权力，“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权力形式并没有这样的戏剧性或邪恶性，毋宁说，这是一种世俗的、平凡的权力”^{[1](3)}。这种权力形式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在政治上没有自主性，相反，它“完全内嵌于法律系统和治理机构中，并因此而得到维持，是一种既是法治也是财治(rule of property)的共和形式”^{[1](3)}。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形式下，“社会的基本要素——财产权利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存，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甚至被排斥在剥削关系之外，如此等等——都以先验的形式行使功能。我们甚至很难看出其背后的暴力因素，因为这是规范化的结果，其强力的使用也是客观的。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所依赖的不是外部的主权利力，而是不可见的内在化的法律”^{[1](4)}。可见，权力被合法化、规范

化和普遍化，这就使得权力变得难以辨识、分析甚至受到挑战。这种权力在社会中运行的直接结果就是，“结构化社会生活，并且让等级制和从属关系看起来自然而然且不可或缺”^{[1](4)}。因此，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权力不是作为自主性的权力，而是作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等级制关系保护者的权力，它不可能逾越等级制的界限。

从现代性产生开始，等级制被理性的权力形式赋予了合理化的内涵。奈格里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对立的权力关系：统治与反抗或者是主权与争取解放斗争的关系。一方面，这种权力关系表现为统治，这种统治来源于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就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之所以是构成性因素，因为它揭示了现代性核心的等级关系。”^{[1](48)}另一方面，这种权力关系表现为反抗和斗争，这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力量。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并非外在于现代性，而是完全内在于现代性之中，内在于权力关系之中。可见，现代性的统治以及反抗统治的斗争是同时出现的。

权力通过不同的形式施加在主体之上，意图实现全面控制主体生命的目的。“在现代性的权力关系中，反现代性得到控制，不只通过臣服的外在形式——从奴隶主的皮鞭到征服者的宝剑，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警察和监狱——更为重要的，也通过主体化的内在形式。”^{[1](55)}这种统治权力强大到使等级制合法化，同时也塑造了被统治者的意识。也就是说，这种权力统治“不只通过暴力和强力而得到实现和维持，暴力和强力毕竟是个别偶然现象；更多是通过心照不宣的同意——也就是说，接受社会中广泛传播的殖民意识模式和知识形式——而实现的”^{[1](55-56)}。强力和意识形态控制是现代性权力统治的两种常见方式，但是，“权力不仅规范意识形态，同时还塑造生命形式，权力完全施加于被统治的主体之上。另外，我们也需注意，权力也是生产性的——不只是外在于主体，行使禁止和压迫的力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也是从内部生产主体的力量”^{[1](57)}。可见，现代性的权力进入了生命的领域，不仅通过一系列方式控制生命，而且不断地再生产这种控制。

针对权力的控制及其反抗之间的关系问题，奈格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说明，他在这里实现了视角的转换——不是从权力统治的视角来看这种关系，而是从主体性的视角来审视。“不应该将权力视为第一性，将反抗视为后起现象；相反，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但反抗是先于权力的。”^{[1](58)}一般认为，当生命权力无所不在地渗透并强加在主体之上时，所有内在

于权力的对象都要臣服于权力。“反抗是依附并从属于其所对抗的权力的。或许有人会向其提议使用具有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反权力’，但这个术语意味着次级权力，与其所反对的权力并无本质区别。”^{[1](36)}这种观点设置了一个前提，即权力先于反抗的自由而存在。在这种视野下，生命成了自由完全被剥削的主体，它对权力的反抗不可能超越当前的权力结构。奈格里在分析了福柯对生命权力与反抗的关系之后指出：“权力只能作用于那些自由的主体。如果奴隶确实处于绝对的统治之下，那么根据福柯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权力施加在他们身上。当然，说奴隶是自由的，这有点自相矛盾。福柯的重点在于，所有的主体都能取得某种自由的空间，不论这种空间是多么有限，从而提供了反抗的可能。说权力只施加在那些‘自由主体’身上，就意味着权力只作用于那些能够反抗的主体、那些先于权力施行而行使自由的主体。”^{[1](53-54)}依据反抗的“自由主体”与统治权力的先在性关系，奈格里指出，“我们所反抗的生命权力在本质或形式上与生命本身的力量截然不同，后者是我们保护与追求自由的基础。为了区别两种‘生命的权力’，我们根据福柯本人的著作，采纳了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biopower & biopolitics)这一对概念”^{[1](36)}。这一对概念表明了权力与生命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生命的生产，还是主体性的生产，都体现了生命主体在抵抗生命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向深不可测的时间开启”^[4]。这是因为，生命的主体性生产是自由的生产，而非生命权力规训下主体的客体化生产，它能生产另类模式，因为它不是结构化的延续，而是一种创造，是“由建构性行动所编织的织体”^{[1](38)}。

针对生命本身创造的与权力相对抗的关系，奈格里进一步指出，生命政治事件“破坏了历史的连续性，破坏了现存秩序。同时，我们也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不只是断裂，同时也是创生”^{[1](37)}。由此可以得出，生命政治的反抗——因为破坏了权力的统治秩序并且构建了新的主体形式——颠覆了自现代性以来的权力关系及其深层的等级制度。奈格里把这种超越了现代性的生命政治创造称为“另类现代性”。他认为：“另类现代性与现代性进行了两次决裂：首先，它扎根在反现代性的斗争中，反对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等级制；其次，它与反现代性相决裂，拒绝辩证的对立，从反抗走向另类秩序的构建。另类现代性拒绝超现代性的信念，即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可以得到改良和完善。反现代性的斗争早已肃清了这些幻象的残余。与后现代的大多数主张相比，另类

现代性提出了新的价值、新的知识以及新的实践。简言之，另类现代性构成了主体性生产的装置。”^{[1](79)}

三、生命政治生产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扬弃

现代性的权力结构并非自下而上产生，从而不具有自主性。它之所以呈现出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形式，之所以能稳固现代性的等级制度，是因为受到了法律和资本的操控。奈格里把法律和资本看作权力的“超越性”平面，认为是它们构成了权力的先验的认知内容。但无论是权力还是其“超越性”平面，它们存在并施行的目的都是保护资本主义内在的私有财产关系。因此，生命政治反抗资本权力在深层次上是对资本的私有财产权的反抗。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资本还是法律，都与私有财产的财产权制度密切相关。私有财产是使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成为可能的前提，没有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资本就无法存在。而对法律来说，财产权是宪法的根本参数，“一切法律都是私法，公法只是资产阶级法学理论家想象出来的意识形态修辞罢了。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事实是，财产的概念以及对财产的保护，依然是所有现代政治构造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直到今天，共和国一直是财产的共和国”^{[1](9)}。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财产共和国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律的目的是保证私有财产权合法化。这样，遵循和保护私有财产的财产权制度就成了资本主义共同维护的准则。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了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5](166)}。可见，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劳动，只不过是外化的劳动。劳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应该是人的生命的展现，但是作为私有财产本质的劳动却表现为人本身的异化和人的生命的丧失，“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来说，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5](168)}。可见，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异化的形式，在本质上是与人的劳动和人的生命相关的。也就是说，私有财产不应该被看作发生和存在于人之外，而应该内在于人之中。因此，反抗或扬弃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财产权制度不应该采取那些与人无关

的、在人之外的斗争。斗争必须深入到人的劳动和生命之中，因为只有“劳动才是私有财产的积极内容”^{[1](13)}。

在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作为资本有机构成中的可变资本而存在。这时的劳动在资本的內部集聚起来，并且受到资本的控制。在资本控制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只能采取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生产模式，并最终使其自身对象化到劳动产品之中。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模式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劳动并不仅仅被限制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生产关系中，“在今天，资本的有机构成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断裂，资本逐渐解体，其中可变资本(尤其是生命政治劳动力)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当然还有与后者相伴随的统治和管控的政治力量。生命政治劳动趋向于生成自己的社会协作形式，并自主地生产价值”^{[1](10)}。

在资本有机构成出现问题的阶段，生命政治劳动提供了一种与之前不同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首先，生命政治劳动具有自主性，在生产过程中不受资本的管控，它能够不依赖于客观物质条件进行生产，而且至少在进行生命政治劳动的过程中，这种劳动是受自我支配的，是自我生命的表达，不受资本的控制。其次，生命政治劳动的产物是生命本身，而非外在的、对象化的产品。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包括图像、信息、知识、情感、符码以及社会关系在内的生命政治产品。可以说，它生产他者和自身，“生产的客体其实也是主体，由社会关系或者生命形式所规定”^{[1](100)}。最后，生命政治劳动再生产社会关系的丰富性，而非对当前社会关系的维持。“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者说，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创造而导致的对社会关系持续不断的再生产。”^{[1](101)}这种资本为了创造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实质上是对当前社会关系的重复，目的是维持当下的社会关系，并没有产生社会关系的新形态。而生命政治劳动不仅再造生命本身，而且是对生命之间进行交互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是对共同性的持续不断的改造和丰富，因而通过生命政治劳动，社会关系能够不断地得到充实与更新。可见，生命政治劳动使劳动概念回到了人本身之中，“生命政治劳动力的能力逾越工作领域，充满整个生命”^{[1](111)}。

奈格里对当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进行了阐述，“经济生产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其造成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就是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变成生命政治生产”^{[1](98-99)}。因此，随着生产进入生命政治语境，资本的剥削对象

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资本主义剥削是对物质商品的剩余价值的剥削，“私有财产在其资本主义形式中，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剥削关系——将人的生产视为商品”^{[1](14)}。可是在生命政治语境中，“当下的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是在劳动过程之外实现，如剥削就以剥削共同性的形式得以实现”^{[1](102)}。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要对共同性进行剥削，一方面，由于共同性是一种财富得以生产的形式，它不仅可以促进物质商品的价值增值，它本身也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共同性是生命政治劳动的产物，它本身就代表着劳动向人的生命形式的复归，这与构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异化劳动形式是相悖的。

可见，摆脱当下资本的私有化必须深入到生命政治语境当中，通过构建并发展共同性来实现。奈格里指出了一种斗争的形式：“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的形式。我们所谓的出走，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过程。因此，出走不是拒绝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而是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1](112)}可见，斗争是从实现自主劳动和摆脱资本控制这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的，其目的就是要使人重新占有他们的劳动成果。“我们需要拿走我们的果实，这就意味着对共同性——我们过去劳动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自主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料——进行再占有。”^{[1](119)}在生命政治语境中，对劳动成果的重新占有就意味着对生命的重新占有。而这在马克思的视角中，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189)}。

四、结语

当代资本的统治已经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从对劳动的占有深入到对生命的全方位控制。针对资本侵入生命活动的现实，新的批判性认识视角已经充分地揭示了资本所运用的统治方式。但是只以这种批判视角为出发点去进行的社会运动总是难以脱离资本逻辑的把控，因为这种社会运动不是把被统治的生命当作主体去进行斗争，相反，它往往是把资本逻辑默认为前提条件，也就是以资本作为主体去实行社会改良，其结果往往是稳定了资本的统治。

奈格里从生命政治这一主体性视角出发,在揭示和批判资本统治的基础上,去寻求生命的主体性反抗的可能性,以及未来变革的新路径,这相比于把生命置于以资本为主体的冷冰冰的客观现实中的批判,无疑具有更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奈格里的这一巨大的理论贡献背后,也存在着某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他把生命政治主体性的反抗力量看作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即生命本身是反抗动力的来源,这一观点是以强调主体力量“自发产生”的动力学思想为前提的,而这或多或少具有过分夸大主体潜能的嫌疑。相比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这一根源出发,以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为动力所揭示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所具有的科学性,奈格里对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反抗的理解则普

遍弱化了从客观性去思考的维度。由此,奈格里后来提出的关于新革命主体的出走等政治行动方案的可行性,是值得商榷的。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4] 莫伟民.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及其与福柯思想的歧异[J].学术月刊,2017(8):58-67.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three principles for biopolitics to resist the domination of the capital: Antonio Negri's radical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LI Y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Negri thinks that the contemporary leftist thinkers tend to interpret biopolitics as the power to control life, but ignore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subjectivity of biopolitics. The resistanc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biopolitics which produces and exists in capitalist society is opposed to the domination of the capital.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esista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uch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domination of the capital as the value standard, the power form, and the system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At the value level, the production of biopolitics creates the special use value which can't be traded as an exchange value in the market of capital through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At the power level, the activity of biopolitics shows us the freedom of the subjectivity, which means that logically speaking, its existence is prior to the power of the domination and its resistance transcends the range set by the power. At the private property level, the labour of biopolitics is autonomous and it can occupy all the production of the labour. The resistanc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biopolitics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cial movement in the modern times, and we must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resistance at first before exploring the ways of changing the world.

Key Words: biopolitics; value; power; private property

[编辑: 胡兴华]